

# 從告於廟社到告成天下\* ——清代西北邊疆平定的禮儀重建

朱 玉麒

## From Praying to the Ancestors and the Heaven and Earth to Declaration to the People: Reconstruction of the Celebration for Pacifying the Northwest Frontier of the Qing Dynasty

ZHU Yuqi

**Abstract :** Battles for restoring the peace of the northwest frontier stretched over the reign periods of Kangxi (1662–1722), Yongzheng (1723–1735) and Qianlong (1736–1795) of the Qing Dynasty, and grand celebration was held for each triumph of the army. Such celebrations consist of two parts. First, according to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military rites, monumental inscription should be erected on the spot where a definitive victory was achieved in the frontier war. In the capital, at the altars to the ancestors and the Heaven and Earth, memorial ceremony and captives offering rite were staged. Second, in line with the ideal system specified in the Confucian Classic *The Book of Rites*, worship ritual should be held in the Confucian temple of Guozijian (i.e. the highest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in feudal China), and a Gaocheng stele (i.e. a stele for declaring the victory) should be set up. This stele shows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military rites of the Qing Dynasty. It declares to the intellect elites of the Han nationality about the new frontier and ethnic groups through the dual educational system combining with central and local Confucian temples and officially recognized schools. Emperors of the Qing Dynasty really attached importance to the declaration ceremony through which the victory could be extended throughout the country. The rulers' attitude can be observed from two aspects: first, the Gaocheng stele in the capital was usually established earlier than the monumental inscription on the battleground which served as a kind of military rites with primary significance. Second, the emperors allowed and encouraged local authorities to model the Gaocheng steles on that of the capital in their Confucian temples, and such remake activities reached a climax in the Qianlong period.

**關鍵詞 :** 清代, 西北邊疆, 平定, 告成太學, 禮儀重建

**Keywords :** Qing Dynasty, the northwest frontier, Pacifying, worship ritual in Guozijian, Reconstruction of the Celebration

\* 本文係2011年度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重大項目“清代西北邊疆平定與國家認同”(11JJD770029) 成果之一。

## 1 引言

滿清入主中原以後，西北邊疆的平定成爲當務之急，康雍乾三世因此屢屢用兵，直到乾隆二十五年（1760）才告成功。乾隆時期的西北平定，主要以二十年平定達瓦齊、二十二年平定阿睦爾撒納、二十四年平定大小和卓的叛亂爲標誌，從而全面擁有了天山南北遼闊疆域的統治權。在乾隆晚年回憶一生所取得的奠定帝國版圖的戰爭中，以“平準噶爾、定回部”的三次戰役所完成乃祖、乃父的未竟之業爲“十全武功”之首（乾隆《御製十全記》）<sup>1</sup>。

在西北平定戰爭的每一次勝利之後，乾隆都會舉行盛大的凱旋儀式來作宣告。留存到後世的紀功碑、平定戰圖、平定方略以及西域輿圖和圖志、同文志等，均作爲戰爭的紀念物，彰顯了清代前期爲建立新的疆域範圍和民族共同體並促成帝國共識的努力。

在西域，平定戰爭結束多年之後，豎立其地的紀功碑確實成爲後世憑弔與吟詠的對象。乾隆四十六年謫戍新疆的前黃梅知縣曹麟開（生卒年不詳），就曾在烏魯木齊寫下《塞上竹枝詞三十首》，其中一首吟詠豎立在伊犁格登山（今新疆昭蘇邊界松拜河東岸）上的平定準噶爾紀功碑：

永和貞觀碣重重，博望殘碑碧蘚封。何似御銘平準績，風雲長護格登峰<sup>2</sup>。

在清代前期平定西北的行軍過程中，曾經發現過永和二年（137）東漢戰勝匈奴而建立的《裴岑紀功碑》和貞觀十四年（640）唐代爲攻克高昌國而建立的《姜行本紀功碑》，甚至還有伊塞克湖畔的《張騫碑》<sup>3</sup>。但在詩人看來，這些記載都不如乾隆平定準噶爾的豐功偉績，以至於御製的格登山紀功碑至今都得到天地風雲的保護。

無獨有偶的是，另一位詩人王曾翼（1733-1794）在乾隆五十年以蘭州兵備道的身份撫諭天山南路時，也寫下《回疆雜詠三十首》，其中一首吟詠了他在葉爾羌（今新疆莎車）所見平定回部的紀功碑：

霍占巢穴剝荒基，斷礎零磚拾燼遺。掃蕩凶氛歸化宇，卿雲長護御書碑<sup>4</sup>。

<sup>1</sup> 《高宗純皇帝實錄》卷一四一四，《清實錄》第26冊，1018頁。

<sup>2</sup> 星漢1996，86頁。

<sup>3</sup> 參朱玉麒2005。

<sup>4</sup> 星漢1996，138頁。

詩歌末句表達對乾隆紀功碑的歌頌方式，與曹麟開如出一轍。這裏的御書碑，指的是乾隆皇帝御製的《平定回部勒銘葉爾奇木（葉爾羌）碑》。

在戰爭的發生地發現紀功碑，從一般的常識來看，並不值得奇怪；但是，當我們發現乾隆年間的金石學家翁方綱（1733-1818）在擔任廣東學政時期編著的《粵東金石略》，已經著錄了距離西北戰場萬里之遙的廣州府學所立平定西北的告成太學碑時<sup>5</sup>，疑問自然發生。

本文的研究，便從這裏切入到清代西北邊疆平定的凱旋禮儀建置中。

## 2 紀功碑與告於廟社——傳統的繼承與弘揚

在邊疆戰爭取得決定性勝利的地點立碑紀功，是清代軍禮重要的凱旋儀式之一。因此乾隆皇帝平定西北邊疆的紀功碑——《平定準噶爾勒銘格登山之碑》、《平定準噶爾勒銘伊犁碑》、《平定準噶爾後勒銘伊犁碑》、《平定回部勒銘伊西庫爾淖爾碑》、《平定回部勒銘葉爾奇木碑》被分別修建於天山南北的重鎮寧遠城（即固爾札，清代伊犁九城之首，今伊寧市）、葉爾羌，以及取得平叛大捷的格登山、伊西庫爾淖爾（今塔吉克斯坦戈爾諾—巴達赫尚自治州莫爾加布區西南）。

這一形式，可以看作是對其祖父康熙皇帝在親征經過地方立碑行爲的繼承。爲了平定噶爾丹的入侵，康熙二十九年（1690）、三十五年、三十六年曾經御駕親征，最後一次抵達歸化城（今內蒙古呼和浩特）部署軍務，因此於四十二年御製《敕賜歸化城崇福寺碑記》的紀功碑文，分別立石於曾經駐蹕的崇福寺（小召）和參加誦經法會的席力圖召寺（延慶寺）。其立碑的目的，也在碑文中明確書寫：“書此勒石，俾後之覽者知朕不憚寒暑、三臨絕塞、爲民除殘之意。”<sup>6</sup>

而事實上，豎立紀功碑是古已有之的邊疆戰爭紀念方式。秦始皇的東封刻石，是其原始。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以來，多次東巡郡縣，分別在嶧山、泰山、之罘、東觀、琅琊、碣石、會稽等處立石題記。這些刻石的重要功能，是“頌秦德”，表達其統一宇內、包有東南沿海的功德。而由此延伸出來的邊塞戰爭奏捷的刻石紀功，則可以追溯到東漢永元元年（89）竇憲抗擊匈奴而由班固撰寫的《封燕然山銘並序》。此後在漢唐以來的邊疆戰爭中，刻石紀功的文獻記載與

<sup>5</sup> 翁方綱《粵東金石略》卷首，乾隆三十六年序刻本，葉六正、背。按，《粵東金石略》卷首所載廣州府學御碑亭內平定碑凡四：《平定朔漠告成太學碑》、《平定金川告成太學碑》、《平定準噶爾告成太學碑》、《平定回部告成太學碑》。

<sup>6</sup> 這一俗稱“平定噶爾丹紀功碑”的論述，可參王宏鈞、劉如仲1984, 55-56、164頁。

<sup>7</sup> 參朱玉麒2005。

實物發現，都印證了對“燕然勒石”這一紀功形式的繼承<sup>7</sup>。清代前期，從康熙親征的《敕賜歸化城崇福寺碑記》<sup>8</sup>，到五十九年平定準噶爾侵擾西藏而於雍正二年（1724）立在拉薩的《御製平定西藏碑》，無疑都是這一傳統表達方式的延續。如上所揭，平定西北的戰爭之後，乾隆效法乃祖的方式而變本加厲，在西域所立紀功碑多達五處，其中《平定準噶爾勒銘格登山之碑》和《平定回部勒銘伊西庫爾淖爾碑》在晚清的中俄交涉中，成為邊界爭論的焦點，因此也更為世人所知曉。

但是，邊疆平定的奏凱軍禮，其重頭戲還在京師，那就是告成和勞師之儀。與本文討論相關的是告成儀式，其在京師的活動又分為兩個階段。

告成儀式的第一個階段是在捷報傳來、不待班師即予舉行的祭祀儀式。這種祭祀，是對出征以前嚮天地神祇、列祖列宗拜祭而許下諾言的還願行為。如《左傳》所記：“國之大事，在祀與戎。”<sup>9</sup>為了獲得戰爭天賦神授的正義性和必勝信念，出征之際通過祭祀來達到堅定軍心的目的，這是從上古鬼神崇拜遺留到宗法社會的重要規則。祀是祭祖，戎是戰爭前的祭祀，其實都是在說國家的大事在於祭祀<sup>10</sup>。祭天是皇帝的特權，作為天子，是天命的繼承人，因此戰爭的勝利首先歸功於上蒼乃至萬物神靈，需要在天壇、社稷壇等特定的場合舉行祭拜天地神祇之儀；而皇位是受命於祖先，故祭拜天地萬物之後，則通過祭拜太廟與祖陵來表達對祖先的告慰。正如《清實錄》記載乾隆皇帝在二十年五月壬辰（十九日）得到平定準噶爾的捷報之後所表述的那樣：“今雖值此捷奏頻仍，遐荒底定，而朕心初不以爲喜，惟有感戴上蒼福佑，列祖貽庥。”<sup>11</sup>這一敘述雖不免矯情，但“上蒼福佑，列祖貽庥”所表達對上天、祖先的感戴，在宗法祭祀的時代，仍然應該相信是其真實而虔敬的心理。

在清代，這些祭祀行為確實都在戰爭的捷報傳來之後即予舉行。如乾隆皇帝於捷報得到的第二天（五月癸巳，二十日），即傳諭派皇子永璋、永琪、永城祭告關外三陵（努爾哈赤的福陵、皇太極的昭陵以及清遠祖的永陵）和關內三陵（順治孝陵、康熙景陵、雍正泰陵）的事宜<sup>12</sup>。而他自身則從乾隆二十年五月庚子（二十七日）起，“以平定準噶爾，告祭太廟，齋戒三日”，至六月癸卯（一日），“告祭太廟，

<sup>8</sup> 在此之前，康熙還有仿照勒銘燕然的方式，在戰爭經行和取得勝利的地點察罕七羅、拖諾山、昭莫多、狼居胥山刻寫銘文的行為，參《聖祖仁皇帝實錄》卷一九〇，《清實錄》第5冊，1016-1017頁。

<sup>9</sup> 《左傳》“成公十三年”條，《十三經注疏》，1911頁。

<sup>10</sup> 具體解釋，可參王學軍、賀威麗2012。

<sup>11</sup> 《高宗純皇帝實錄》卷四八九，《清實錄》第15冊，134頁。

<sup>12</sup> 《高宗純皇帝實錄》卷四八九，《清實錄》第15冊，136-137頁。

上親詣行禮”<sup>13</sup>。此後又在六月己酉（七日）傳諭：“平定準噶爾捷聞，……朕仰承先烈，集此大勳，保泰持盈，彌深兢業，親告成功於太廟，郊、社、岳、瀆諸祀，次第遣官敬謹舉行，以昭茂典。”<sup>14</sup>親詣太廟、派官告祭天地萬物諸神的安排，充分顯示了他對祭祀儀式的虔敬用心。

告成儀式的第二個階段是大兵凱旋後的獻俘儀式，即獻俘禮。這是從周武王滅商而告廟獻俘即已有之的儀式，魏晉以後重新為歷朝所遵循，而北周則進一步確定為“獻俘於太廟”的制度；到了唐朝，邊疆戰爭尤其重視獻俘禮的舉行<sup>15</sup>。如《唐會要》所載西北戰爭中，貞觀四年張寶相俘頡利可汗，獻俘於太廟；二十三年阿史那社爾執龜茲王訶利布失畢及其相那利等，獻於社廟；永徽元年（650）高侃執突厥車鼻可汗，獻太廟；顯慶三年（658）蘇定方俘賀魯，獻於昭陵、告於太廟……<sup>16</sup>。這些都是獻俘太廟的實際例證。

這種獻俘禮儀，同樣為清代邊疆平定的凱旋儀式所繼承。據《清實錄》記載，獻俘儀式在雍正二年（1724）平定青海之際確立，並分獻俘、受俘兩個步驟：

（雍正二年四月）癸亥，總理事務王大臣議奏：“青海大捷，應獻俘於太廟，恭請皇上臨御午門受俘。”得旨：“平定青海，實乃皇考留貽之功，故捷音到日，恭告景陵。今造逆首惡吹拉克諾木齊、阿爾布坦溫布、藏巴札布等三人檻送來京，朕令議獻俘太廟之禮，以慰列祖在天之靈。諸王大臣等乃議請受俘，歸功於朕，非朕本意也。可否只行獻俘，不行受俘之禮？諸王大臣等再察典禮具奏。”尋議：“出師凱旋，執獲醜類，獻於廟社，即受俘於廷，歷代行之，大典攸昭，應請允行。”從之<sup>17</sup>。

（雍正二年閏四月）癸未，以平定青海所獲叛逆俘囚吹拉克諾木齊、阿爾布坦溫布、藏巴札布三人解送至京，行獻俘禮，遣官告祭太廟、社稷。……丙戌，王以下文武百官齊集午門前，設鹵簿，鳴金鼓，上御午門樓前楹，陞寶座受俘。兵部官率解俘將校，將平定青海所獲叛逆俘囚吹拉克諾木齊、阿爾布坦溫布、藏巴札布三人白練繫頸，跪伏。兵部堂官奏：“所獲俘囚，謹獻闕下。”上命交刑部，於是刑部官領旨，兵部官引俘押出，王以下文武各官行禮畢，上回宮<sup>18</sup>。

<sup>13</sup> 《高宗純皇帝實錄》卷四八九、四九〇，《清實錄》第15冊，144、150頁。

<sup>14</sup> 《高宗純皇帝實錄》卷四九〇，《清實錄》第15冊，159-160頁。

<sup>15</sup> 相關概括，可參蓋金偉2010。

<sup>16</sup> 《唐會要》卷一四《獻俘》，371、372頁。

<sup>17</sup> 《世宗憲皇帝實錄》卷一八，《清實錄》第7冊，306頁。



這一獻俘於太廟和社稷、受俘於午門的禮儀，確實為乾隆所繼承。如達瓦齊事：

乾隆二十年十月丁巳（十七日），俘酋達瓦齊、羅布札、莽喀、圖巴、敦多克、和通等，解送至京。兵部率解俘官兵，押俘由長安右門入，進天安右門，至太廟街門外，嚮北立，候告祭大臣至，令俘嚮北跪，告祭大臣進太廟行禮。畢，兵部率解俘官兵，押俘至社稷街門外，令俘仍嚮北跪，告祭行禮，如前儀。……戊午（十八日），上詣皇太后宮問安。御午門樓，王公百官朝服侍班，鏡歌大樂，金鼓全作，兵部堂官以解到俘酋達瓦齊、羅布札、莽喀、圖巴、敦多克、和通等，跪奏請旨。命達瓦齊等著免交刑部，俱交理藩院。理藩院堂官跪領旨，押俘出天安右門，王公百官行慶賀禮<sup>19</sup>。

文字記錄猶嫌不足，對於這些儀式所顯示的“天朝”胸懷，乾隆皇帝還策劃了中國和西洋的宮廷畫家為之畫圖存照。如曾經著錄於《石渠寶笈》、近年以昂貴的價格拍賣出來的徐揚手繪《平定西域獻俘禮圖》，即是對乾隆二十五年平定回部獻俘餞禮的情景描繪<sup>20</sup>。這一儀式更由乾隆皇帝敕命法國人耶穌會修士 Denis Attiret（王致誠，1702-1768）繪製，後來被刻成銅版十六幅之一流傳<sup>21</sup>；而包含這一儀式的、收藏於故宮博物院的丁觀鵬手繪《平定伊犁回部戰圖》二十幅，也是那個時期完成的作品<sup>22</sup>。

獻俘禮在京師太廟和社稷壇的完成，也象徵了對於天地、祖先告祭的最終完成，成為告成軍禮的高潮和終結。從紀功碑到凱旋告祭這一切完備的禮儀，可以看作一個盛世所確立的、繼承歷代漢文化傳統祭祀儀式的踵事增華。

但這還不是全部！

從捷報傳來開始，一個本質性的變化貫穿在告成儀式的始終，那就是告成碑和釋奠太學的儀式出現，反映出中國古代最後一個王朝在告成禮建置上登峰造極的狀態。

<sup>18</sup> 《世宗憲皇帝實錄》卷一九，《清實錄》第7冊，312、314頁。

<sup>19</sup> 《高宗純皇帝實錄》卷四九九，《清實錄》第15冊，273-274頁。

<sup>20</sup> 參聶崇正2009。

<sup>21</sup> 參高田時雄2009。

<sup>22</sup> 王宏鈞、劉如仲1984，119-124頁。他如平定金川的獻俘圖，也都有徐揚的繪本和據捷克人耶穌會神父 Ignace Sichert（艾啟蒙，1708-1780）繪本刻制的銅版畫行世，此處不贅。

### 3 告成碑與釋奠太學——復古名義下的創新

作為戰爭紀功碑的一種新形式——“告成太學碑”在康熙三十七年首次出現。這就是豎立在太學即國子監的《平定朔漠告成太學碑》。《清實錄》記載：

（康熙三十七年十月乙巳，）先是，上親征朔漠，蕩平厄魯特噶爾丹，諸王大臣等請立碑太學，以垂萬世。至是，御製碑文曰……<sup>23</sup>。

康熙的碑文本身也對這一事件做如此敘述：

惟朕不得已用兵以安民，既告厥成事，乃蠲釋耆災，潔事禋望，為億兆期昇平之福，而廷臣請紀功太學，垂示來茲。朕勞心於邦本，嘗欲以文德化成天下，願茲武略，廷臣僉謂所以建威消萌，宜昭斯績於有永也。朕不獲辭，考之《禮·王制》有曰：“天子將出征，受成於學，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讖告。”而泮宮之詩亦曰：“矯矯虎臣，在泮獻讖。”又《禮》：“王師大獻，則奏凱樂，大司樂掌其事。”則是古者文事、武事為一，折衝之用，俱在樽俎之間，故受成、獻讖，一歸於學，此文武之盛制也。朕嚮意於三代，故斯舉也，出則告於神祇，歸而遣祀闕里。茲允廷臣之請，猶禮先師以告克之遺意，而於六經之指為相符合也。爰取“思樂泮水”之義，為詩以銘之，以見取亂侮亡之師，在朕有不得已而用之之實，或者不戾於古帝王伐罪安民之意云爾<sup>24</sup>。

以上佔據了碑文一半篇幅的文字，都在申說告成碑的撰寫是因為廷臣的請求，並表現出不肯居功自傲的低調姿態。其實這是帝王虛飾的套語，從紀功碑的源頭秦始皇起，其東封刻石也都充斥了“群臣相與誦皇帝功德，刻於金石，以為表經”（《琅琊臺刻石》）、“群臣誦功，請刻於石，表垂於常式”（《之罘刻石》）這樣的用詞<sup>25</sup>。《清實錄》和康熙碑文的這種說法，也可以看作是虛矯文辭的一種“用典”。而其他喋喋於符旨六經的典故運用，則正符合其在所有的場合不斷標榜的上承三代、儒家立國宗旨。

《清史稿》對康熙凱旋儀式的完整描述是：

<sup>23</sup> 《聖祖仁皇帝實錄》卷一九〇，《清實錄》第5冊，1015頁。

<sup>24</sup> 同上注，1016頁。

<sup>25</sup> 《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247、249頁。

康熙三十五年，聖祖征噶爾丹，破之，還蹕拖諾，捷入，焚香謝天。……帝謁堂子如儀。明年，朔漠平，班師亦如之。還宮後，遣祭郊、社、宗廟，遍群神，謁陵寢，御殿受賀。直省官咸進表文，頒詔如制。帝自勒銘鑿石，並建碑太學云<sup>26</sup>。

可見，康熙是在完成了為歷代所踐行的祭告儀式之後<sup>27</sup>，加上了建碑太學這一內容<sup>28</sup>。其建立告成太學碑的經典依據，是《禮記·王制》：“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禱於所征之地，受命於祖，受成於學，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sup>29</sup>作為對周朝禮儀制度的理想型還原，《禮記·王制》對天子出征的軍禮做了如上規定。但如前所揭，軍禮中的凱旋之儀在春秋以來凋零而重新恢復，告於廟社這一內容一直作為軍禮的核心而被歷代沿襲，而釋奠告成於學的內容，卻並沒有在歷代受到重視。而且周禮的所謂學，是各尊其師以為學，並非以孔子為唯一的先師。尊孔子為先聖、先師，並建立太學釋奠禮儀祭孔，是唐代以來被完善的<sup>30</sup>。因此在軍禮衰而又興的過程中，以孔子為素王而不與武事，在軍禮中捨棄釋奠於孔廟的行為並非不正常。

孔穎達概括《禮記》中的釋奠禮儀云：“凡釋奠有六：始立學釋奠，一也；四時釋奠有四，通前五也；《王制》師還釋奠於學，六也。”<sup>31</sup>康熙在平定朔漠的凱旋軍禮中“遣祀闕里”之後又“告成太學”的作為，可以說是在祭孔禮儀中第一次真正完整了六種釋奠禮。這不僅反映了他在以儒家思想為立國根本的指導意識下，一方面是為其武力的征服尋找合理的解釋，所以強調“古者文事、武事為一”；而更重要的另一方面，也有超邁前代而直接周統的意願表達<sup>32</sup>。乾隆皇帝對乃祖的意圖心領神會，御製的《平定準噶爾告成太學碑》提及：“在古周宣，二年乙亥。淮夷是平，《常武》詩載。越我皇祖，征噶爾丹。命將禡旗，亦乙亥年。既符歲德，允協師貞。”<sup>33</sup>其四言銘文的內容和形式，不僅是對康熙武功與周

<sup>26</sup> 《清史稿》卷九〇“禮·軍禮”，1766頁。

<sup>27</sup> 其中“帝謁堂子如儀”的堂子，是清帝祭神之所，可以看作是清代皇帝在以漢文化為主導的軍禮中保存的滿族特色的祭祀行為。魏源《聖武記》卷一二：“《會典》：皇帝拜天則於堂子，出征拜天亦如之。……則堂子自是滿洲舊俗，祭天、祭神、祭佛之公所。”《魏源全集》第3冊，519-520頁。

<sup>28</sup> 包括《清史稿》未提及而在《平定朔漠告成太學碑》中記載的“遣祀闕里”，即曲阜祭孔。這一行為與釋奠太學並建碑，都為雍正以後的凱旋儀式所繼承，茲因篇幅關係，不作鋪敘。

<sup>29</sup> 《禮記正義》卷一二，《十三經注疏》，1333頁。

<sup>30</sup> 參高明士1980、1982。

<sup>31</sup> 《禮記正義》卷一二，《十三經注疏》，1406頁。

<sup>32</sup> 歷代統治者特別是康熙皇帝推崇孔子的意識形態分析，可參黃進興2010；特別是其中第二部分《皇帝、儒生與孔廟》。



宣王平淮的對接，同樣也是對平定準噶爾的自許——這一點，毫無疑問存在着滿清帝王以遊牧關外而入主中原、尋求正統皇權的先天意識。

康熙的告成碑行爲，繼而爲雍正所繼承。《清實錄》記載：

（雍正二年六月）乙酉，……禮部題請撰擬平定青海碑文，勒石國學，頒發直省，以昭功德。碑文曰……<sup>34</sup>。

雍正的《平定青海告成太學碑》因此也矗立在國子監，碑文交代勒銘的緣起，仍然以廷臣有請爲藉口而張揚“稽古典禮”的正統性：

廷臣上言，稽古典禮：出征而受成於學，所以定兵謀也；獻誠而釋奠於學，所以告凱捷也。宜刊諸珉石，揭於太學，用昭示於無極，遂爲之銘曰……<sup>35</sup>。

乾隆皇帝也同樣遵循了乃祖、乃父的告成方式，每次的邊疆平定，都以告成太學碑的建立爲終結。這一儀式，最早是在乾隆十四年的凱旋儀式中實現<sup>36</sup>。那一年的《平定金川告成太學碑》也這樣記載：“廷臣舉皇祖朔漠、皇考青海成例，請勒碑成均，以示來許。”<sup>37</sup>其後《平定準噶爾告成太學碑》：“武成而勒碑文廟，例也。禮臣以爲請，故據實事書之。”<sup>38</sup>一方面推諉於群臣的請求，一方面托詞於祖、父的成例；而事實上，乾隆對於告成太學碑的建立，較之康熙、雍正更爲積極。趙翼（1727-1814）的《簞曝雜記》記載：

上聖學高深，才思敏贍，爲古今所未有。御製詩文如神龍行空，瞬息萬里。平伊犁所撰告成太學碑文，屬草不過五刻，成數千言。讀者想見神動天隨光景，真天下之奇作也。尋常碑記之類，亦有命汪文端具草者，文端以屬余。余悉意結構，既成，文端又斟酌盡善。及進呈，御筆刪改，往往有十數語祇用一二語易之、轉覺爽勁者，非親見斧削之跡，不知聖學之真不可及也<sup>39</sup>。

趙翼入直軍機處而目擊乾隆御製詩文的回憶，敬仰情緒的表白之外，還揭示了兩

<sup>33</sup> 《高宗純皇帝實錄》卷四九九，《清實錄》第15冊，278頁。

<sup>34</sup> 《世宗憲皇帝實錄》卷二一，《清實錄》第7冊，342頁。

<sup>35</sup> 同上注，343頁。

<sup>36</sup> 《高宗純皇帝實錄》卷三三五，《清實錄》第13冊，595-596頁。

<sup>37</sup> 《高宗純皇帝實錄》卷三三五，《清實錄》第13冊，597頁。

<sup>38</sup> 《高宗純皇帝實錄》卷四九九，《清實錄》第15冊，277頁。

<sup>39</sup> 趙翼《簞曝雜記》卷一“聖學”一，李解民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7頁。

層事實：一是尋常碑記由屬下具草，二是《平定準噶爾告成太學碑》確實是由乾隆親自撰寫。而後一層事實，表達了乾隆對於平定準噶爾、對於告成太學兩個事件的高度重視。

告成太學的凱旋禮儀，是有清一代帝王在軍禮中的“復古式”創建。這一禮儀的重建，被後來的思想家魏源（1794-1857）在《聖武記》中慧眼獨具地揭示出來：

（康熙三十六年）四月，上復勒銘狼居胥之山而還。朔漠平，至京師御門受賀，上親撰碑銘，勒石太學。古帝王武功，或命將，或親征，惟以告於廟社，未有告先師者。在泮獻馘，復古制，自我聖祖始<sup>40</sup>。

《聖武記》的寫作，是魏源有感於鴉片戰爭以來“海警遼至”的國家危機，而以歌頌清代前期的武功來激發後世抵禦侵略的意志。以勒石太學的方式恢復《禮記·王制》的理想制度而表達告祭先師、在泮獻馘的含義，由他在撰述中第一次被揭示出來。從撰寫《聖武記》的創作動因而言，這毫無疑問是值得他為清代前期的文韜武略大書特書的創舉。

然而，假託復古的名義在軍禮中表達直接上古的道統、尊崇孔子的儒學這一理念，僅僅是告成太學的唯一目的嗎？

#### 4 告成天下——禮儀重建的終極目的

清代皇帝建立平定邊疆而告成太學的紀功碑，是恢復周代禮制而釋奠於學的表現。但在這一目標之後，告成碑更達到了告成於天下的目的。

太學是漢代以來在京師設立的中央最高學府，清代則從隋朝的改名，稱為國子監、國子學；而在一些復古的場合，又以太學相稱。唐代以來，中國古代的教育體制確立了“廟學制”的學政合一形式。從武德二年（619）開始，國子監內建立周公、孔子廟各一所，四時致祭；貞觀二年，又停祭周公，僅釋奠於孔廟<sup>41</sup>。在逐漸形成了“左廟右學”的國子監形制之外，唐代前期也將這一學制普及到州、縣，使孔廟釋奠禮儀在州學、縣學中得到貫徹，而具有了“天下通祀”

<sup>40</sup> 魏源《聖武記》卷三“康熙親征準噶爾記”，《魏源全集》第3冊，118頁。魏源在《聖武記》卷三“雍正兩征厄魯特記”以及卷四“乾隆平定準噶爾記”、“乾隆勘定回疆記”、“道光重定回疆記”中，均特別提及勒碑太學一事，可見其對此事的認可。參《魏源全集》第3冊，137、153、162、184頁。

<sup>41</sup> 《唐會要》卷三五“褒崇先聖”，635頁。

的儒學教育局面。同時，釋奠禮儀也成爲五禮體系中吉禮的一大類，與祭祀天神、地祇、人鬼並列<sup>42</sup>。因此，從唐代以來，國家的官學體制內，從中央到地方的孔廟釋奠禮儀，成爲精英文士通經問學、獲得功名的必由途徑。

清代在太學舉行的祭孔釋奠禮儀，也更爲錦上添花。順治以來的歷屆皇帝，均曾親自參加太學的釋奠禮，並創立所謂“臨雍釋奠”的親詣行禮儀式。《清朝通典》概括：“世祖章皇帝定鼎中原，以京師國子監爲太學，親臨視學，躬祭文廟。聖祖仁皇帝臨雍釋奠，典禮優隆。世宗憲皇帝尊禮先師，崇封五代，且又特定春秋親祭之禮儀，文益爲隆備。我皇上臨御之初，加崇文廟，詔易黃瓦，繼又重新殿廡，厘定題榜，特頒法物，以備禮器。凡春秋丁祀，屢經躬詣行禮。近又新建辟雍，親臨釋奠，大典益昭。”<sup>43</sup>而對地方廟學的興盛，也不無自豪地誇耀說：“伏惟我朝德化覃敷，崇尚儒術，四海之內，學校如林。聖天子揆文奮武，拓地二萬餘里，昆侖、濛汜，皆我膠鬲。文治之隆，亙古未有。”<sup>44</sup>可見乾隆時代的官員，已經將乾隆在告成碑中宣告的“拓地二萬餘里”說法作爲“今典”而用入《清朝通典》的編纂中了。

康熙皇帝以來“告成太學碑”的建立，以健全《禮記》釋奠制度爲己任，而體現出復古崇儒的意旨。同樣，他們也希冀通過這一精英文士薈萃的儒學之門，更大範圍地宣傳其平定天下的武功。這種意願，自然也通過嚮地方廟學頒發碑文的形式來達成。如《清朝通典》記載：

（康熙）三十七年十月，頒御製平定朔漠碑文於直省學宮。

（雍正）二年六月，頒御製平定青海碑文於直省學宮。

（乾隆）十四年十二月，頒御製平定金川告成太學碑文於直省學宮。

二十年十月，頒御製平定準噶爾告成太學碑文於直省學宮。二十六年六月，頒御製平定回部告成太學碑文於直省學宮<sup>45</sup>。

將平定碑文頒發到各省學宮（即各省廟學）的廣而告之意圖，自然也爲地方官員所領悟。《清實錄》記載：

（乾隆二十五年三月）是月，直隸總督方觀承奏：“平定回部，御製告成太學碑文，請於畿輔九府、六直隸州，各照勒一碑。”得旨：“不必如此，保定立一碑足矣。”又奏：“請將乾隆二十年平定準噶爾御製告成太

<sup>42</sup> 參朱濞2011。

<sup>43</sup> 《清朝通典》卷四八“禮·吉·釋奠”，2309-2310頁。

<sup>44</sup> 同上注，2315頁。

<sup>45</sup> 同上注，2315頁。

學碑文，一併摹勒。”得旨：“是。”<sup>46</sup>

方觀承（1698-1768）的這個上奏，比《清朝通典》記載的頒發日期要早，顯然是碑文還沒有頒到時即予表態，並且在得到了皇帝的首肯後，又一不做、二不休地上奏將乾隆二十年的平定準噶爾的碑文也要求一併摹勒。雖然在《清實錄》上，我們看到的是方觀承開啟了地方造碑的先河，而事實上各地官員於此前後紛紛在從直省到府、州、縣的文廟從事造碑邀寵的工程。原本僅僅是告成於中央最高學府——太學的碑文，在那個時候開始了在全國各地文廟的造碑運動<sup>47</sup>。《清實錄》在稍後的乾隆二十九年記錄了這樣一則有關各地造碑的諭旨：

十二月甲申。諭軍機大臣等：“蘇爾德奏‘平定準噶爾碑文各省學宮地勢不一不必拘定尺寸並遴委通曉清文旗員摹寫刊刻’一折。各省、府、州、縣、衛學宮，自不能一律高敞，著必照部頒碑式豎立，轉難位置適宜。至外省士子，本不諳習國書，碑內亦可毋庸令其鐫刻。嗣後各學立碑，視該處採石難易及學宮地勢，聽其酌量隨宜建豎，其清文竟不必刻入，兼可省傳寫錯訛之弊。著於各督撫奏事之便，一併傳諭知之。”<sup>48</sup>

這個諭旨的下達原因，是因為蘇州布政使蘇爾德（生卒年不詳）在地方建立平定碑的具體操作過程中遇到了問題而上奏。地方立碑的主要困難是受限於各地的文廟格局而無法按照太學原碑尺寸摹刻、以及太學碑文滿漢合璧而地方上摹刻滿文難以保證準確。乾隆皇帝為此下達了各地廟學立碑可以不必拘於尺寸、也可以省略滿文的諭旨。在寬宏大量的背後，反映了乾隆皇帝對於地方建立告成碑只要達到為外省士子閱讀目的的實用態度，以及急於求成、務必周知的迫切心情。——告成太學碑隱藏着的“告成天下”、特別是告成於漢族知識分子，才是乾隆皇帝所代表的清代統治者所追求的真正目的。

告成太學的內容，主要是張揚大清的武功使得西北邊疆已經成為中華一統的地理疆域，這是乾隆皇帝在平定回部之後告諭所謂“計道里則塞垣以外，更擴二萬有餘；論時日則軍興以來，不越五年之內”所要表達的意思<sup>49</sup>，也是刻寫在

<sup>46</sup> 《高宗純皇帝實錄》卷六〇九，《清實錄》第16冊，850頁。

<sup>47</sup> 從目前所見地方殘存平定碑的情況看，康熙三十七年《平定朔漢告成太學碑》、雍正二年《平定青海告成太學碑》、乾隆十四年《平定金川告成太學碑》均已見於一些地方府、州、縣的文廟，可見平定碑在地方上的建立時間當在方觀承奏報之平定準噶爾和平定回部告成太學兩碑之前。具體的地方造碑過程，筆者當另撰《清代平定邊疆立碑全國考》詳論。

<sup>48</sup> 《高宗純皇帝實錄》卷七二四，《清實錄》第17冊，1067-1068頁。

<sup>49</sup> 《高宗純皇帝實錄》卷六〇〇，《清實錄》第16冊，718頁。

《平定準噶爾勒銘伊犁碑》中“自今伊始，四部我臣，伊犁我宇”、《平定回部告成太學碑》中“古不羈縻，今爲臣子，疆辟二萬，兵出五年”所要表達的意思。《平定準噶爾告成太學碑》更以批駁放棄邊疆的“守在四夷、羈縻不絕、地不可耕、民不可臣”論調，而強調“此以論漢、唐、宋、明之中夏，而非謂我皇清之中夏也”，宣告清代中華帝國所建立的新的疆域與民族概念。這個新的“共同體”概念如何成爲知識精英、特別是漢族知識分子的共識，正是這一以復古爲幌子而重建的凱旋禮儀最終達到的目的——由告成太學而實現告成天下的宣傳方略。

告成太學碑所能達到的宣傳目的，確實爲清代帝王所重視。因此再回首檢視上述清代的凱旋禮儀，傳統的在戰爭發生地建立紀功碑的措施雖然仍被實行，但遠遠落在了新的告成碑建立之後。如前所揭，康熙帝在三十七年平定噶爾丹的當年，即在國子監豎立了《平定朔漠告成太學碑》；而在歸化城的兩塊《敕賜歸化城崇福寺碑記》，直到四十二年方御製頒賜。乾隆皇帝《平定準噶爾勒銘格登山之碑》等碑刻的建立，據《清實錄》的記載，似乎到乾隆二十五年才開始施工<sup>50</sup>，直到二十七年八月，方“監造妥協”<sup>51</sup>。而此時，平定準噶爾和回部的告成碑不僅早在京師國子監大成殿阼階前豎立，地方廟學的摹勒工程也已經風起雲湧地開始實施。

## 5 結論

如上所述，清代邊疆戰爭的凱旋軍禮由繼承傳統的刻石邊地和告於廟社，以及以復古爲名義而釋奠孔廟和告成太學的創新共同組成。這個禮儀重建的過程，也是帝國新秩序的宣傳渠道被創建的過程。

如果說傳統的對於太廟的祭告，仍然措意於“我大清萬年宗社無疆之庥”的帝王一家之天下意識的話<sup>52</sup>；那麼，告成太學的祭告禮儀創建，則努力於將帝國江山的新秩序成爲天下士子的共識。這個目的，毫無疑問是達到了。

<sup>50</sup> 《高宗純皇帝實錄》卷六〇一：“（乾隆二十四年十一月己巳，）又諭兆惠等：‘酌派官兵一千，來春往伊犁巡查，則刻石之事，自可兼辦。今定長處既有工匠，著即發往葉爾羌，先行刻石紀功，俟工竣後，再同發往官兵前往伊犁，於格登山刻石。’”《清實錄》第16冊，743頁。

<sup>51</sup> 《高宗純皇帝實錄》卷六六八：“（乾隆二十七年八月己亥，）諭軍機大臣等：‘阿桂等奏原任主事富魁帶領匠作於固勒札、格登山監造御製碑文事竣，可否量予獎賞等語，富魁前因獲罪，留於軍營效力，今既將固勒札、格登山碑文俱監造妥協，富魁著加恩授爲前鋒，仍在本旗行走。’”《清實錄》第17冊，469頁。

<sup>52</sup> 《高宗純皇帝實錄》卷四八九，《清實錄》第15冊，136頁。



我們不僅看到前揭翁方綱的《粵東金石略》已經著錄下廣東府學的告成碑，看到魏源的《聖武記》已經發現告成碑的獨創性；而且，當平定準噶爾的事件發生之際，曹雪芹（1715-1763）在《紅樓夢》裏也以文學的筆法隱晦地稱道這一事件時<sup>53</sup>；當龔自珍（1792-1841）在嘉慶二十四年就寫下超越時代的《西域置行省議》時<sup>54</sup>；當沈垚（1798-1840）在道光初年“閉戶家居”於江南一隅，卻寫下具有絕大識力的《新疆私議》時<sup>55</sup>，——可以相信，西域的疆土已經成為這些知識精英認定的中華帝國新的共同體不可分割的部分；而影響其觀念的因素裏，一定有那些平定西北告成太學的碑刻，曾經出現在他們的視線裏。

### 參考文獻

《清朝通典》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年。

《清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5-1986年。

《清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

《十三經注疏》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

《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

《唐會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

《魏源全集》長沙：岳麓書社，2004年。

《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

黃進興 2010.《優入聖域：權力、信仰與正當性（修訂版）》北京：中華書局。

王宏鈞、劉如仲 1984.《準噶爾的歷史與文物》西寧：青海人民出版社。

星漢 1996.《清代西域詩輯注》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

馮其庸 2009.《〈紅樓夢〉六十三回與中國西部的平定》《紅樓夢學刊》第6輯：1-9頁。

高明士 1980.《唐代的釋奠禮制及其在教育上的意義》《大陸雜誌》第61卷第5

<sup>53</sup> 參馮其庸2009。

<sup>54</sup> 參紀大椿1977。

<sup>55</sup> 孫燮《沈子敦哀辭》：“著《新疆私議》……徐舍人松一見歎曰：某謫戍新疆，凡諸水道，皆所目擊，然猶歷十年之久，始知曲折。沈君閉戶家居，獨從故紙中搜得之，非具絕大識力，曷克有此？”沈垚《落帆樓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92年影印嘉業堂本，卷尾，葉一背。

期：20-38頁。

- 高明士 1982.《隋唐廟學制度的成立與道統的關係》《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學報》第9期：93-122頁。
- 高田時雄 2009.『平定西域戰圖解說』京都：臨川書店；譚皓中譯本，《西域文史》第6輯，北京：科學出版社，2011年：301-313頁。
- 蓋金偉 2010.《“獻俘禮”與“北庭大捷”質疑》《西域研究》第1期：52-57頁。
- 紀大椿 1977.《龔自珍和他的〈西域置行省議〉》《新疆歷史論文集》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1977年：354-368頁。
- 聶崇正 2009.《觀徐揚畫平定西域獻俘禮圖卷》《收藏家》第3期：32-34頁。
- 王學軍、賀威麗 2012.《“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的原始語境及其意義變遷》《古代文明》第2期：92-98頁。
- 朱溢 2011.《唐代孔廟釋奠禮儀新探：以其功能和類別歸屬的討論為中心》《史學月刊》第1期：33-40頁。
- 朱玉麒 2005.《漢唐西域紀功碑考述》《文史》第4輯：125-148頁。

高田時雄教授退休紀念 東方學研究論集 [中文分冊]

---

East Asian Studies

Festschrift in Honor of the Retirement of Professor TAKATA Tokio

2014年6月2日 発行

編集 東方學研究論集刊行會

---

製作 株式会社 臨川書店  
〒606-8204  
京都市左京区田中下柳町8番地

RINSEN BOOK CO.  
8, Tanaka-Shimoyanagi-Cho, Sakyo-ku,  
Kyoto 606-8204, Japan